

社会学研究

# 制度认知及其影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温莹莹

**【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认知会通过影响个体行动显著影响一项制度的实施效果。制度的认知框架将帮助个体理解现实，并有助于其开展饱含意义的行动。借鉴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研究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400份农户问卷的定量分析，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意愿的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而由于挤出效应，项目制度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由此，不同的制度认知导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实施的效果不同。

**【关键词】**制度认知 公共物品供给 参与意愿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项目制

**【作者简介】**温莹莹，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21) 03-0016-11

## 一、引言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事关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长期以来备受人们关注。提供良好的村庄公共物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但税费改革之后，村庄财政能力被极大削弱，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表现为村庄自筹公共投资项目数量锐减。<sup>①</sup>

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村级财政，并试图通过中央和省市级政府自上而下的转移支农项目资金和村庄内部“一事一议”等制度，安排解决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事一议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11年之前，村级公共物品自愿性供给的主要方式是“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通过村民的筹资筹劳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上级政府不给予奖励或补助。但研究发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sup>②</sup>无法有效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合法性机制研究”(16CSH04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编辑与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罗仁福、张林秀、黄季焜等：《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第1295～1310页。

② 李琴、熊启泉、孙良媛：《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4期，第34～37页。<http://www.cnki.net>

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出现的困境，2011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一制度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基础上，增加了上级政府的“财政奖补”。

随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推广，农村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应运而生。近年来，项目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项目化运作都极为常见。<sup>①</sup>项目制设定专项目标，配备专项资源推进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sup>②</sup>本研究关注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有关且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密切相关的项目制。从资金构成上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中，国家出资、地方政府配套以及村庄内部自筹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且三方将根据项目规模与具体要求承担不同的资金比例。

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政府财政对村级公共项目的奖补比例一般能达到50%及以上，但仍未做到全额补助，村民筹资筹劳仍然是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秀义等在福建的调查显示，在扣除财政奖补和村集体以及社会捐赠资金后，有些村庄村民筹资筹劳仍然占到一事一议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31.48%。<sup>③</sup>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下，村级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国家项目资金不可能完全包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尤其是税费改革与项目制共同导致的农村内部组织能力弱化问题，加剧着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sup>④</sup>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项目化运作下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其单纯的资金补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甚至还可能因弱化了村庄内在组织能力而导致新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sup>⑤</sup>

综上，即便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安排下，大部分村庄还是得依靠村民自筹来启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而项目制下，即便有再多包括财政补助在内的资源，仍然需要基层的组织能力来有效组织村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可以说，提高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之一。由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问题，试图具体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背景下影响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第二，人们对村庄相关制度安排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

## 二、制度认知视角下的公共物品供给

关于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已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起来，现有研究主要从行动者与制度两个层面探讨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的行动者视角和制度视角理论。然而，行动者视角和制度视角的研究各自独立存在，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将两者结合起来。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认知理论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在行动者层面，既有研究和理论认为，个体的理性特质、身份以及心理动机等都会影响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首先，基于理性人假设，经济学常用囚徒博弈困境模型来解释与分析理性

① 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第1~37页；陈家建：《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机制——基于一个国家项目的历史过程分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0~173页。

② 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第82~102页。

③ 李秀义、刘伟平：《财政奖补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合作困境的破解——基于福建39个村庄的实证分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年第1期，第91~100页。

④ 贺雪峰：《农村公共品供给：税费改革前后的比较和评述》，《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28~34页。

⑤ 李祖佩：《项目制基层实践困境及其解释：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1~122页。http://www.cnki.net

个体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行为。<sup>①</sup> 如有研究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农户的参与意愿受其风险态度、投入成本等理性态度的影响。<sup>②</sup> 其次,一系列实验研究表明,公共物品覆盖人群规模大小、个体投资于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个体的异质性、社会角色、社会偏好、初始禀赋、社会关系等,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以及个体参与行为均有显著影响。<sup>③</sup> 另有研究发现非农、外出务工等个体身份特征会显著增加其公共物品供给参与。<sup>④</sup> 最后,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行动者参与合作动机的来源,发现亲社会者因集体观念、合作道德观等社会价值取向而更偏向于在公共物品供给困境中采取参与合作策略,个体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是影响其合作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sup>⑤</sup>

在制度层面,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表明,不论是自发产生的非正式制度还是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首先,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方面,中国农村主要存在包括宗族、宗教以及地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已有研究论证了这些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着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论是中国农村的宗族、宗教,还是村庄习俗、道德等非正式制度,都对人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具有积极影响。<sup>⑥</sup> 其次,除了非正式制度,更多研究还关注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制度、一事一议制度以及项目制等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许多学者验证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正向影响。<sup>⑦</sup> 现有理论认为,项目化运作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完善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机制;提升了村民和村干部参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提高了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sup>⑧</sup> 但是,只有少数实证研究分析了一事一议、项目制对村级公共物品的具体影响,个别研究论证了财政奖补对一事一议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正向作用。<sup>⑨</sup> 例如:有研究采用福建省调查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促进了村级公共物品

① M.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罗小锋:《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9~34页。

③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信任水平的测度及其对合作的影响——来自一组实验微观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第54~64页;陈叶烽、周业安、宋紫峰:《人们关注的是分配运机还是分配结果?——最后通牒实验视角下两种公平观的考察》,《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第31~44页;宋紫峰、周业安、何其新:《不平等厌恶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管理世界》2011年第12期,第14~27页;U. Fischbacher and S. Gächter, Social Preference, Beliefs, and the Dynamics of Free Riding in Public Good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0 (1), 2010, pp 541-556.

④ 白南生、李靖、辛本胜:《村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强度和融资意愿——基于安徽凤阳农村居民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7期,第49~53页。

⑤ D. De Cremer and E. Van Dijk, Reactions to Group Success and Failure as a Function of Identification Level: A Test of the Goal-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in Social Dilemm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5), 2002, pp 435-440; D. De Cremer, S. Dewitte and M. Snyder, "The Less I Trust, the Less I Contribute (or Not)?" The Effects of Trust, Accountability and Self-monitoring in Social Dilemm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1 (1), 2001, pp 93-105; 王沛、陈莉:《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心理学报》2011年第1期,第52~64页。

⑥ Lily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Yiqing Xu and Yang Yao,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2), 2015, pp 371-391; 温莹莹:《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T村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3~133页。

⑦ 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33~166页。

⑧ 陈杰、刘伟平、余丽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绩效及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福建论坛》2013年第9期,第133~138页。

⑨ 卫宝龙、凌玲、阮建青:《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5期,第48~53页;余丽燕:《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3期,第331-340页。

的供给；<sup>①</sup> 还有实证研究发现，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行有助于村集体实施村民最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而且提高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行为。<sup>②</sup> 此外，一项新近的研究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通过对辽宁省 125 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其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在最近 3 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 1.3 项村级公共物品。<sup>③</sup>

综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动者视角与制度视角的研究，行动者视角强调了农民个体的某些特征因素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影响，制度视角则主张村庄中的基层民主、宗族网络、习俗惯例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对公共物品供给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已有的制度视角的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似乎预设了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一定可以发挥约束组织与行动者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常常在现实中发现某些制度的实施收效甚微。因此，在制度视角下，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制度一定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影响吗？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一项制度安排想要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真正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制影响，首先需要具备合法性。<sup>④</sup> W. 理查德·斯科特 (W. Richard Scott) 曾指出，组织或一套制度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sup>⑤</sup> 社会学家们应用“合法性”概念来指称这一方面。斯科特讨论了制度合法性来源的三大基础要素。他指出，不同的社会理论家先后把规制性 (regulative)、规范性 (normative) 和文化—认知性 (cultural-cognitive) 系统分别定为制度的关键要素。三大要素对应的合法性基础分别是法律制裁、道德支配和可理解、可认知的文化支持。<sup>⑥</sup> 关注规制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强调遵守规则是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关注规范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强调制度的合法性机制蕴含在深层的道德基础中；关注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则强调遵守共同的情境界定、参照框架、被认可的角色模板等获得合法性，即通过最深层的认知一致性与共享价值来寻求合法性。<sup>⑦</sup> 由此，法律制裁、道德支配以及文化认知三大要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

制度使行动成为可能，为行动提供信息，赋予行动合法性，并且制约知识和行动被建构的方式。<sup>⑧</sup> 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国内外已有不少有关制度合法性机制的研究，但对作为制度合法性三要素之一的认知合法性机制，还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合法性的规制性要素强调要与已经确立的制度规则相一致，认知性要素则强调行为选择被（关于现实的）知识所限制和充实。<sup>⑨</sup> 认知框架帮助行为主体理解现实，并帮助行为主体展开对其有意义的行动。意义在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并且

① 李秀义、刘伟平：《财政奖补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合作困境的破解——基于福建 39 个村庄的实证分析》，《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5 年第 1 期，第 91~100 页。

② 罗仁福、王宇、张林秀等：《一事一议制度、农村公共投资决策及村民参与——来自全国代表性村级调查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经纬》2016 年第 2 期，第 30~35 页。

③ 周密、刘华、屈小博等：《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 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155~160 页。

④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2), 1983, pp 147-160.

⑤ W. Richard Scott and Soren Christensen, eds.,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5.

⑥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8~59 页。

⑦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 69~70 页。

⑧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 51 页。

⑨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 51 页。

在对现实的阐释中被接受而得以延续。既有研究通过“确定性”与“日常互动”来理解认知因素，制度化能够为个体带来确定性的信息与频繁稳定的日常互动经验，从而提高认知合法性。如施奈普、圭伦等人的实证研究，通过对39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股份交易制度化所带来的认知合法性提高将增加恶意收购的发生率。一般而言，稳定而长久的日常互动经验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所有行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套共同的话语和理解，这种共同的话语和理解是通过制度化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产生、固定并得到强化的。人们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一套共享认知框架，并在框架中互动和使用一套标准话语来交换信息。<sup>①</sup> 同样，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参与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日常互动经验有利于产生意义和相互协调。因此，对与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的制度（如民主制度、一事一议以及项目制）的关注与认知，很有可能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分别从个体行动者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但未同时结合行动者和制度两方面因素讨论个体对制度安排的认知是否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影响。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制度认知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由此，我们提出本项研究的主要假设：人们对村庄各项制度安排（与公共物品供给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和项目制度等）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

### 三、制度认知对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影响

#### （一）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1. 数据介绍

本项研究的定量数据来源于笔者2016年7—8月期间在福建省莆田市、福州市开展的问卷调查。<sup>②</sup> 我们采用多阶段随机概率抽样，从莆田市和福州市随机抽取4个乡镇，每个乡镇（以所辖所有村庄为抽样框）随机抽取10个村庄，共40个村庄。每个村庄采用随机概率抽样方法抽取10户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中总共发放了4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92份，回收率为98%。具体的问卷填答一般由户主完成，当户主不在时，由其他成年的家庭成员填答。在入户问卷调查的同时进行相关的访谈，补充必要的定性访谈资料。农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经济水平等个人信息，也包括“所在村庄是否有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村庄是否有国家资助的公共项目、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薄弱村、是否愿意参与村庄公共项目”等各项涉及个人认知与行为测量的指标。其中，我们用个人月消费与家庭月消费来预估被访者的经济水平状况。

#####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项研究主要考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项目制、民主选举等制度认知是否会显著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因变量是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水平。在问卷中，我们用李克特量表来测量人们的参与意愿水平，具体定义为“一般而言，您对我们村庄所开展的各项公共项目的参与意愿（包括捐资或者投入义务工）是？”回答则从“非常不愿意、比较不愿意、一般、比较愿意到非常愿意”五个等级水平，自低到高用1分到5分为五个等级赋值。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所调查的样本中，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愿平均水平为3.33分，处于中等水平。

① [美] 威廉·D. 施奈普、[美] 毛罗·F. 圭伦：《公司的治理、合法性与模式》，[美] 弗兰克·道宾主编：《经济社会学》，冯秋石、王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50页。

② 数据是2016年8月份收集，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未使用和公开发表过。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事一议、项目制等相关研究不少，但未有实证研究从制度认知对人们公共参与的影响视角进行分析讨论，本项研究是首次运用最新相关定量数据对这一问题开展实证研究。|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我们的主要预测变量是人们对民主选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等制度实施情况的认知。问卷使用“我们村庄是否有实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我们村庄是否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项目”“我们村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和“我们村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薄弱村”四个指标，来测量人们对所在村庄是否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或项目制等制度的认知。其中的模范村是指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在村庄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方面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代表并获得荣誉称号的村庄；薄弱村是指村庄原有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水平较低而需要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其公共建设的村庄。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均被视为有项目制实施的村庄。考虑到被调查的所有样本村庄都实施了民主选举制度，我们在问卷中用“您是否参与了最近一次村庄民主选举投票”来考察人们对村庄民主选举制度的关注与认知程度。表 2 报告了这几个变量的频数与占比情况。从中可见，在所调查村民的认知中，49.4%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实施了一事一议制度；59%的村民认为所在村庄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项目；10.2%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2.4%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薄弱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几个指标均是被调查者对制度实施的认知情况，并不等同于村庄的客观实际情况。同时，表 2 还显示过半的被调查者对村庄选举制度关注度较高，55.2%的被调查者参与了最近的一次村庄选举投票。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in	Max	Mean	Std. Dev.
年龄	18	85	38.54	15.323
家庭月消费（元）	300	60000	4211.86	4202.329
个人月消费（元）	0	10000	968.602	867.816
公共项目参与意愿水平（分）	1	5	3.33	1.105
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分）	1	5	3.59	0.954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分）	1	5	1.89	0.763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分）	1	5	3.03	0.937

表 2 主要变量的频数表

Variable	是（%）	否（%）
性别（是=女，否=男）	54.9	45.1
是否党员	10.5	89.5
是否属于大姓（所属姓氏占比超过 1/3）	81.4	18.6
村庄是否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49.4	50.6
村庄是否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项目	59.0	41.0
村庄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模范村	10.2	89.8
村庄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薄弱村	2.4	97.6
是否参与上次村庄民主选举投票	55.2	44.8

除了因变量与主要预测变量，我们还加入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党员、经济水平（个人消费与家庭月消费）、是否属于大姓、公共项目满意度、对邻居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主要来源于以往研究，如钱文荣等人的研究梳理了可能对农户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意愿产生影响的四大因素：个体特征（性别、年龄、社会身份和受教育水平）、家庭特征因素（经济水平与社会资本/所属大姓）、村级民主因素（民主选举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现状（村

庄已有公共物品供给情况)。据此,本项研究的控制变量也大致分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与政治面貌)、家庭特征(经济/消费水平与所属大姓)以及社会态度(包括社会信任与公共物品满意度)三项,具体参见表3。各项控制变量的主要情况见表1与表2。由各表数据可见,此次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当,差不多各占一半;平均年龄为38.5岁,其中党员占比10.5%;个人月消费均值为968.602元,平均家庭月消费为4211.86元;宗族是家庭特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属姓氏属于村庄大姓的比例超过一半,高达81.4%;人们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以及对村干部的信任均处于中等水平,分别为3.59分与3.03分,而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较低,均值只有1.89分。

## (二) 回归分析

本项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考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和民主制等制度认知对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OLS: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sig .	VIF
主要预测变量: 制度认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sup>a</sup>	0.439*	0.217	1.902	0.061*	1.276
国家项目 <sup>a</sup>	-0.107	-0.051	-0.438	0.663	1.352
项目制的模范村 <sup>a</sup>	-0.652*	-0.207	-1.843	0.069*	1.237
项目制的薄弱村 <sup>a</sup>	-1.057	-0.107	-0.864	0.390	1.504
参与上次村委会选举投票 <sup>b</sup>	-0.285	-0.139	-1.213	0.229	1.290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sup>c</sup>	-0.293	-0.142	-1.150	0.254	1.501
年龄	0.003	0.051	0.340	0.735	2.244
文化程度	0.069	0.109	0.717	0.476	2.271
是否党员 <sup>d</sup>	0.017	0.006	0.046	0.963	1.554
家庭特征					
是否属于大姓 <sup>e</sup>	0.553*	0.215	1.886	0.063*	1.273
个人月消费	8.980E-006	0.079	0.501	0.618	2.408
家庭月消费	3.842E-005	0.140	0.898	0.372	2.386
社会态度					
对村庄公共物品满意度	-0.048	-0.046	-0.391	0.697	1.359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0.125	0.095	0.850	0.398	1.226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0.145	-0.128	-1.102	0.274	1.327
常数项	2.892***		3.221	0.002***	
R	0.451				
R-Square	0.203				
Sig	.028				
F	1.326				

注: #P<0.1, \*P<0.05, \*\*P<0.01, \*\*\*P<0.001; a是=1, 否=0; b未参与投票为参考变量; c女性为参考变量; d非党员为参考变量; e不属于大姓为参考变量。VIF为共线性诊断统计量, VIF<10时, 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有序 Logistic：一事一议、项目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sig.
截距 1	0.555	3.248	0.29	0.864
截距 2	1.806	3.243	0.310	0.578
截距 3	3.404	3.255	1.094	0.296
截距 4	6.371	3.299	3.728	0.053
制度认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sup>a</sup>	0.925**	0.451	4.210	0.040**
国家项目 <sup>a</sup>	-0.170	0.470	0.131	0.717
项目制的模范村 <sup>a</sup>	-1.290*	0.674	3.665	0.056*
项目制的薄弱村 <sup>a</sup>	-2.480	2.453	1.022	0.312
参与上一次村委会选举投票 <sup>b</sup>	-0.412	0.449	0.840	0.359
个体特征				
性别 <sup>c</sup>	-0.727	0.491	2.193	0.139
年龄	9.723E-007	0.018	0.000	1.000
文化程度	0.091	0.186	0.239	0.625
是否党员 <sup>d</sup>	0.363	0.714	0.258	0.612
家庭特征				
是否属于大姓 <sup>e</sup>	1.092**	0.556	3.858	0.050**
个人月消费	0.000	0.000	0.014	0.907
家庭月消费	0.000	8.471E-005	2.299	0.129
社会态度				
对村庄公共物品满意度	-0.145	0.234	0.384	0.536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0.132	0.279	0.223	0.637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0.311	0.256	1.480	0.224
模型 P 值	0.003			
卡方	99.543			

注：#P<0.1, \*P<0.05, \*\*P<0.01, \*\*\*P<0.001；a 是=1，否=0；b 未参与投票为参考变量；c 女性为参考变量；d 非党员为参考变量；e 不属于大姓为参考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整体模型显著，对所有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VIF 值处于 0~10 之间，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分析<sup>①</sup>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等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态度多项变量之后，我们的主要预测变量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本项研究所考察的三大制度认知中，只有民主选举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公共物品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度的认知情况对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都有显著影响，且从标准回归系数来看，两者的影响程度差不多（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217 与 -0.207）；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与人们参与意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项目制制度认知与人们参与意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第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

① 因回归分析的因变量“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分为五个程度等级，具有序列变量特征。我们在表 4 中提供了有序回归分析模型，对此回归分析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有序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通过稳健型检验，除了具体的指标数值不同，有序回归分析结果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所有自变量中，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度认知以及“归属大姓”三大因素对因变量具有显著性影响。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即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有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人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更高。第二,项目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意愿的影响较为复杂:如果人们认为村庄只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对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如果人们认为所在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薄弱村,对其参与意愿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如果人们认为所在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就会对他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相对于其他非模范村,当人们认为所在村庄是被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模范村时,他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参与捐资或投入义务工的意愿反而会降低。

如何理解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模范村项目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却是负向影响?或许制度合法性理论与政府财政支持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制度合法性理论认为,制度的规制、道德规范与文化认知要素均可增加一项制度的合法性水平,由此促进该项制度的有效实施。<sup>①</sup>一事一议制度本质上是有关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的实施及其认知,提升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合法性,提高了人们的参与意愿。关于一事一议制度何以促进人们的公共参与,新近有研究认为是一事一议制度的民主化决策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公共参与;<sup>②</sup>有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制度所蕴含的公权力对人们的行动具有约束力;<sup>③</sup>还有研究认为一事一议制度作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制度,只有在政府财政奖补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促进村民的公共参与。<sup>④</sup>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研究从制度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讨论。正如有研究指出,在熟人社会的村庄里,人们在公共物品参与中既非纯粹的搭便车者,也非纯粹的合作者,而是在重复博弈中成为有条件的合作者。<sup>⑤</sup>“有条件的合作者”即预设了人们会根据自己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者、参与者以及相关制度的认知来调整自己是否合作参与供给。我们在这里首次运用相关定量数据论证了这一预设。此外,已有研究认为,政府的财政支持对农户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效应可以分成三类,即引致效应、挤出效应和汲水效应。<sup>⑥</sup>在本研究中,或可解释为模范村项目制度认知给村民带来的是挤出效应:一方面,国家资金重点支持模范村,政府供给代替了农户的自我供给,使得政府公共投资排挤了农户供给,降低了人们的参与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投资的增加使得人们对政府供给的依赖性增加,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参与意愿。

其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等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态度多项变量,大部分对人们的公共物品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家庭特征中的“所属姓氏属于村庄大姓”一项对人们的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该项变量视为宗族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这就不难理解其对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了。宗族制度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大多数村庄,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村庄治理结构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们所调研的福建省,宗族因素的存在更为普遍。莫里斯·弗里德曼在研究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情况后指出:“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

①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55~81页。

② 罗仁福、王宇、张林秀等:《一事一议制度、农村公共投资决策及村民参与——来自全国代表性村级调查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经纬》2016年第2期,第30~35页。

③ 王振标:《论村内公共权力的约束力——从一事一议制度困境谈起》,《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6期,第12~25页。

④ 周密、赵晓琳、黄利:《村内公共产品筹补结合供给模式的收入及空间效应——基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分析》,《农村经济》2019年12期,第81~87页。

⑤ 刘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对微观主体的激励效应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财政研究》2016年第5期,第76~89页。

⑥ 钱文荣、应一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14期,第39~50页。

起，以至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sup>①</sup>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村民之间的血缘关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村民之间的互动多集中于宗族范围内。相对于村庄层面的“半熟人社会”，宗族内部则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熟人社会”。<sup>②</sup>“熟人社会”中充满了高密度的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以及有效的信息传播，都有利于促进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sup>③</sup>

#### 四、结论与启发

提供良好的村庄公共物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税费改革之后，国家主要通过一事一议制度以及项目化运作等制度安排，力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但国家资金不可能包揽全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户仍然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主体，村庄内部的组织能力以及农户的参与意愿对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始终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与制度层面探讨影响人们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各项因素，鲜有研究同时结合个体与制度因素，研究人们的制度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项研究通过随机概率抽样，对福建省莆田市、福州市等40个村庄的400户农户开展问卷调查，研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等制度安排背景下人们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问题，并试图论证制度认知对人们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定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主要可作以下几点讨论：

第一，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中，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愿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既有研究认为，农户常常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因此他们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普遍偏低。<sup>④</sup>而本项关于福建省两市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相对乐观，人们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第二，总体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社会信任等各项个体、家庭特征以及社会态度，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不过，在福建农村地区，宗族因素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对人们的参与意愿有着重要、不可忽视的显著正向影响。人们常常预设各项个体特征和社会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公共参与，但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及以往一些研究结果所表明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对其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sup>⑤</sup>其中或许存在宗族、制度认知等中介因素的影响，对此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第三，通过回归分析，我们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民主选举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明显，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度认知均对人们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可见，人们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认知超越其民主协商、财政补给的内涵。具体是何种认知带来了合法性，值得我们通过今后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sup>⑥</sup>目前可

①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24~134页。

③ Robert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④ 罗小锋：《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556户农户的调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29~34页。

⑤ 钱文荣、应一迢：《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14期，第39~51页；B Herrmann and C Thöni, *Measuring Conditional Cooperation: A Replication Study in Russia*,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 12 (1), 2009, pp 87-92.

⑥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运用同一时期福建和北京调研数据的比较分析以及个案质性研究，进行了部分讨论。参见温莹莹：《制度认知合法性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23~132页；温莹莹：《国家—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基于北京、福建定量数据的比较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24~33页。

知的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项目制度认知则由于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

上述研究发现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在中国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不仅与其相关的各项制度安排会影响人们的参与意愿，而且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情况也会对其参与意愿带来显著影响。不过，由于定量研究的局限，本研究对制度认知的概念操作化相对简单，未能涵盖制度认知的所有内涵。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认知是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基础。在文化视角下，制度认知不仅在于语义符号层面，更包含主观的信念、被感知的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符号系统以及嵌入性的制度化行为等。<sup>①</sup>新制度主义认为，认知是外部世界刺激与个人机体反应的中介，“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作为被创造者的人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此人对其环境的内在表象的一个函数”。<sup>②</sup>同时，以往研究发现，人们会在日常互动中累积经验，并在互动中使用一套标准话语来交换信息，形成人们对制度合法性的积极认知。在今后的研究与具体实践中，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的设计层面，更重要的是要持续关注人们的制度认知问题。制度认知是影响一项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引导人们对相关制度安排形成积极、有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地构建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责任编辑：陈涛 王华）

## The Cognition of Institution and Its Influenc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Wen Yingying

**Abstract:**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ies maintain that the cognition of an institution will obviously influence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through influencing on individual actions. The cognitive frame of institution will help individuals comprehend reality, assisting them to carry out meaningful ac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questionnaire research on 400 households in the rural areas in Fujian province, this study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demonstrates the obvious influence of the cognition of institu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cognition of “one decision for each project on financial rewards” institution has brought the legitimacy that promotes the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However, the cognition of project institution will reduce this willingness to some extent due to the crowding-out effect. Thus, different kinds of cognition of institution can bring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one decision for each project on financial rewards” institution and project institution.

**Keywords:** cognition of institutio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willingness of participation; one decision for each project on financial rewards; project institution

① [美] W. 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17页。

② Roy G. D'Andrade, Cultural Meaning Systems, in Richard A. Shweder and Robert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88-119.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